

宋代诗话诗本质论

朴 亭 順*

— <目 次> —

- | | |
|----------|------------------------|
| I. 诗言志 | III. 以意为主 |
| II. 吟咏情性 | IV. 诗言志, 吟咏情性, 以意为主的比较 |

研究诗学, 首先就会遇到诗的本质论这一问题。不对诗这一特定的文体作一界定, 当然就无从深入谈及其他诗歌理论。诗的本质及特徵是自古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将从宏观角度论述诗歌本质, 论述时以宋代诗话之所及为基础, 对典型的宋代诗话中的有关资料加以评论, 本论文将通过对宋代诗话著作中关于‘诗言志’‘吟咏情性’‘以意为主’等关于诗本质论的命题进行考察和探讨, 进一步了解宋人对诗本质的认识, 从而探索宋代诗话中关于诗本质论的特徵, 整理宋代诗话中诗本质论的历史意义。

I. 诗言志

‘诗言志’是古代诗学概念, 体现出古人对於诗歌的本质特徵的认识, 是儒家传统诗论之一。它从文艺主体论出发, 概括说明了诗歌文学表现思想感情的特徵。但在先秦时期, 这一理论是比较朦胧的。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意识的发展, ‘诗言志’说进入唐宋以来, 日趋增强了审美意识, 不仅如此,

* 岭南大学校 讲师

把传统诗论从主体意识的表现延伸到對於客体的探索，进展得更深入，更广泛了。

先秦两汉诗学的‘言志’论在宋代随着儒学复兴得以进一步提倡。“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鲁直专学子美，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凜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岂可与鲁直诗同年而语耶？”¹⁾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以孔子‘思无邪’来衡量各朝代诗人诗作，认为惟独陶渊明，杜甫可称道，而各朝各代落邪思者甚多，他特别指责黄庭坚邪思之尤，认为‘思无邪’出自於诗的本质即‘诗者，志之所之也。’同时‘在心为志’就是强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这里，不难看出先秦以来儒家思想对宋代诗歌本质论的影响。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产生和发展，经世致用思潮促动，儒家的诗教在宋代已被比较完整地继承下来。《诗大序》强调的‘言志’必须“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情’自然是不能超越封建伦理规范的，因而诗歌的政治教化影响仍然很大。不过孔子的‘思无邪’一语，本是概括了《诗经》三百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特点，并非後儒所专指的思想教化。‘无邪’之正，指的就是诗歌的思想情感，语言及乐调的中和之美，其界限是比较宽广的。但宋儒的理论发挥，表现为思想保守，理解偏狭。“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执其器，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则声乐之所助於诗者为多。然犹曰：兴於诗，成於乐’。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於声者少，而发其义者多。仲尼所谓思无邪，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诚以诗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诗可得而言

1) 张戒，《岁寒堂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3248页。

也。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就使得之，其钟鼓之鉴铎而已。”²⁾ 朱熹强调诗之本为‘诗言志’。“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纯一之地，其於诗固不学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於其间者，而况於古诗之流乎？”³⁾ 作为理学家和诗人的朱熹，要求以‘诗言志’为根本，认为决定诗作高下的是德足求志，而不是作诗创作技巧。朱熹站在性理学的立场上，主张不专意於雕琢刻画，而要在根本上下工夫，以道德人格的涵养为重，保持心灵的纯正。

“兴於诗，言学诗者可以感发於善心也，如观<天保>之诗，则君臣之义修矣。观<常棣>之诗，则兄弟之爱笃矣。观<伐木>之诗，则朋友之交亲矣。观<關雎><鹊巢>之风，则夫妇之经正矣。昔王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废讲 <蓼莪>，则诗之兴发善心於此可见矣，而以考其言之文为兴於诗则所求於诗者外矣。非所谓可以兴也。然则不学诗，无以言何也。盖诗之情出於温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声也。不得其心，斯不得於言矣。仲尼之教伯鱼，固将使之兴於诗而得诗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出言有章矣。岂徒考其文而已哉。诗之为言发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轻，其辞婉，其气平，所谓入人也深。其要归必止乎礼义，有君臣之义焉，有父子之伦焉，和乐而不淫，怨诽而不乱，所谓发言为诗，故可以化天下而师。”⁴⁾ 《礼记·经解》篇中，有‘温柔敦厚’之说，它是‘诗言志’说的理论表现型态中影响重大的一种，作为‘诗言志’的一个思惟模式，要求“其辞婉，其气平，所谓入人也深，其要归必止乎礼义，”因而限制了诗歌文学现实主义的反映批评精神。“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後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馀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

2)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五，《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3) 朱熹，《朱熹诗话》，〈答杨宋卿〉，《宋诗话全编》第六册，6128页。

4) 《游廬山集》卷一，《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後，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⁵⁾ 张戒指出诗意是诗人应当具有的本意，而诗人的本意就是‘诗言志’。他在《岁寒堂诗话》中，引用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来强调诗歌内容上，应当以言志为主。对‘咏物写景乃是馀事’的看法，说明诗人应当分清‘言志’与‘咏物’之间主次关系，‘诗言志’本质论重要命题得到充实和发展。在这段论述中通过对各朝代典型性概括，强调了‘言志’的重要性。在宋代‘言志’的强调正是意味着对‘诗人之本意’的重视。虽然指责‘潘，陆以後，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但对‘咏物之工，卓然天成’却是颇加赞美。并点出‘兼而有之者，李，杜也’。他强调诗人应有意於‘言志’，专意咏物将会失去诗人本旨。“用事押韵，何足道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就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⁶⁾ 张戒提出的‘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主张，认为应当以抒写情怀，发扬风雅言志精神，寄托情思为根本目的；咏物写景不过是馀事而已。他以苏轼，黄庭坚为例，劝诫後人不要专意咏物。

正如陈良运所阐明：“‘言志’说位居中国诗歌理论序列之首，它的内涵不断的丰富与意义的不断延伸，使它免於成为一种僵化的理念，而像一条动脉贯穿於历代诗歌肌体之中。诗人‘言志’的自觉意识，一方面发展了中国重‘表现’的抒情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历代诗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流，绝大多数诗人都积极入世，勇於面世，以天下为己任，在人生，社会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中，表现出‘志’的高，大，远，洁。”⁷⁾ 至宋代，‘诗言志’观点是继承发扬儒家传统诗学思想，成为宋性理学文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於重道德轻艺术的思想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文人的诗歌创作。

5) 张戒，《岁寒堂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3235页。

6) 张戒，《岁寒堂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3237页。

7) 引用，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3页。

II. 吟咏情性

《尚书·舜典》中的‘诗言志’，‘志’与‘情’意义上虽然相通，但‘志’主要是指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态度。‘采诗观志’的制度正由此而来。《毛诗序》明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结合‘志’‘情’对诗歌本质进行论述，并对‘情’加以重视强调，肯定诗之‘吟咏情性’的特点，进一步体现了诗歌的创作特点。但‘吟咏情性’仍不能脱离儒家的伦理制约，‘情性’是指人们对时政的一种普遍性情感，是以儒家功利主义的观点来反映社会心态的。魏晋是中国古代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文艺创作中，关注人的主观情感，再有就是追求辞采韵律之美。晋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则正显示了这种审美意识的理论。自然‘吟咏情性’不再是普遍的社会心态的表现，‘情性’反映的是个体性的心理特徵，人的才气，性格，气质，心境，情感，思绪……。由於玄学思潮的影响，此时已开始突破了儒家诗学本质论的范畴开启了纯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而唐代文人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崇尚个性的诗歌创作观念，坚持以个体性的‘情性’为诗本质。诗人们侧重於诗歌本质与表现技巧形式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唐宋时期文人们提倡的‘诗言志’说，不仅是涉及政治教化的理性规范，而且可以容纳生动的个性化的情感活动，充分发挥诗歌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作用，从抒发个人情志，进一步要求去反映生活。正如唐孔颖达所解释：“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⁸⁾ 那麼宋代诗话著述中，‘咏吟情性’诗学本质论又是如何表述的呢。

“山谷云：‘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於庭，怨詈於道，怒邻骂坐之所为也。’余谓怒邻骂坐固非诗本指，若《小弁》亲亲，未尝无怨，《何人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未尝不愤。谓不可谏争，则又甚矣，箴规刺诲，何为而作！古者帝王尚许百工各执艺事以谏，诗独不得与工技等哉！故谏而不斥者，惟《风》为然。”⁹⁾ 黄庭坚明确地指出诗可以反映人的性情，但不能成

8) 唐孔颖达，《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一疏》

9) 黄彻，《碧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408页。

为政教的工具。不过他仍然在强调‘温柔敦厚’式的‘性情’说，还是没能摆脱汉儒诗教的影响。“诗以吟咏情，性使人有所感发，而温厚和平。”¹⁰⁾ ‘温厚和平’也是同上说法，要求诗情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谗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什麽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诗中数处皆应答之诗 …”¹¹⁾ 朱熹强调诗的抒情性，同时指出千篇一律将诗变为‘美刺说’就会破坏诗意。‘美刺’之说，成为系统理论概念是汉儒之事。《毛诗序》中：“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譎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明确地提出了‘美刺’概念。对後代古典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作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虽数次上旨反对与金主和，却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的人性论。因为理学家把‘克己’作为道德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克己’活动中获得一种崇高的心理体验和感情享受。因此，他对‘美刺’说不以为然。他从诗人感物道情的角度来理解诗意，体现了作为诗人的朱熹对诗歌吟咏情性本质论的肯定。

宋代文人从传统儒家诗学观念来解说‘吟咏情性’，“约言全诗之义，示人以性情之教也。盖诗道性情者也，得其性情之正，则无邪思矣。诗之所以为教者 如此。故夫子有感於《騶篇》之辞，而揭以示人曰：吾门之教以诗为称首旧矣，盖其端起於志，而其效可以兴，吾尝欲约其旨以示人，乃即於诗得之。夫诗三百至多也，而吾直以思无邪之一言蔽之而已矣。何则礼以齐民坊欲，而诗则极其情之所至而不禁。盖人心之有者，不可无也。要以发乎情者止之乎礼而已。乐以易俗移风，而诗则仍其俗之所尚，而不改盖人事之著者，不必削也，要以兴於诗者，成之於乐而已。人情之切者莫如饮食，然而礼，即由是始初焉矣”¹²⁾ 不外乎诗教，诗道都要‘得其性情之正，则无邪思矣’，

10) 《耻堂存稿》卷五，《四库全书》，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11) 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12) 《钦定四书文》卷二，《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但对‘人事’‘人情’‘人心’也应加适当考虑，而认为‘发乎情者，止之乎礼而已’则是不变的准绳。“伊川解曰：诗发於人情止於礼义，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学，兴起於诗。礼者，人之模范，守礼所以立其身也。安之而和乐德之成也，又语录曰：兴於诗者，吟咏情性，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至也。”¹³⁾宋代文官为主体的封建官僚社会里，文人们追求人生的‘三立’，即‘立德’，‘立功’和‘立言’。居於首位的‘立德’，就是注重道德自律，克制个人的情感欲望，以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崇尚圣贤人格，理学家主张：‘兴於诗者，吟咏情性，涵畅道德之中’理所当然是很自然的。“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恣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馀，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於性情哉。”¹⁴⁾邵雍提出的‘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於性情哉。’的观点，明确指出‘吟咏情性’之诗本质论的内涵。点明诗歌创作规律必由本质去发掘。“风雅颂以为经，赋比兴以为纬，此诗之义也。或曰诗之中皆有六义，如豳风豳雅豳颂是也。其亦有说乎，有善则美，有恶则刺，此诗之体也。然亦有男女咏歌，各言其情者，岂皆为美刺而作乎。或以诗为国史，吟咏情性而作闾巷小民之辞，岂皆出於国史乎。或以诗为孔子被之弦歌，以合<韶><武>之音，怨忿淫佚之语，岂皆合於<韶><武>乎。”¹⁵⁾黄干所撰的《勉斋集》中，结合《诗经》六义的说法，作了几种反问，‘男女咏歌恋情，闾巷小民之辞，怨忿淫佚之语’如此等类诗歌，怎麼能都看作是为‘美刺政教’，‘国史吟咏’，‘<韶><武>之音’而作。实质上，他要突破传统诗学‘吟咏情性’的本质论中功利主义的观点，诗歌本质论‘吟咏情性’中拓展纯粹个体性的心理因素。

“诗不必工，工於诗者泥也。诸所以吟咏性情，足以寄吾之情性之妙可

13) 《论孟精义》卷四下，《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14) 《击壤集》自序，《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15) 《勉斋集》卷二十六，《四库全书》，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矣。奚必工前輩，有以放而詩者，謝靈運是也。有以狂而詩者，李太白是也。有以寓而詩者，陶淵明是也。有以窮而詩者，郊島是也。有以怨而詩者，屈平是也。以文為詩者昌黎。以史為詩者少陵。……”¹⁶⁾ 虽同是‘吟咏情性’，但抒情的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謝靈運的‘放’，李白的‘狂’，陶淵明的‘寓’，其他‘窮，怨，文，史’，為了體現‘吟咏情性’，應不受創作手法的約束。“詩以吟咏情性為主，不以聲韻為工。以聲韻為工，此晉宋以來之陋也。逮其後復有次韻，有用韻，有賦韻，有探韻，則又以遲速較工拙，以險易定能否，以抉擿前志為該洽，以破碎文体為新奇，轉失詩人之旨；以纂類之書，充厨滿几，而為士者，乏体习持养之功，滋欲速好径之病，流風靡靡，未之能改也。”¹⁷⁾ 魏了翁指出‘以聲韻為工，此晉宋以來之陋也’，并具体点明各种诗歌创作弊端，进而强调‘詩以吟咏情性為主’。这是从創作的角度要求‘吟咏情性’的诗歌讲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自然而然，不加繩削地呈現人的自身天性，感受和体会。“語不驚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驚人為能，與古異矣。後生承風薰染積習，甚者推敲二字，毫厘必計，或其母忧之，謂是兒欲呕出心乃已。鑿磨鍛煉至是而極。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天成者乎。”¹⁸⁾ 这里‘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天成者乎’也正是宋代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论所追求的诗作风格。甚至连大理学家朱熹也有同感，“或言陶潜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为诸家之体然後可及，非至论也。人固有识高而才短者，其势易为古淡才高而识短者，其势易为豪华。夫能用其所长，处其所易已足以为智者。有才识兼至而学。为古今体者，趣古淡则为陶潜，趣飘逸则为李白杜牧，何可以为常哉。夫詩之为道，要在吟咏情性，发於自然，乃得至乐。有意於是体，牽合而後为之，不亦有伤於性乎，非詩之至也。”¹⁹⁾ 可见‘要在吟咏情性，发於自然’，这一观点已被宋代文人所共识。“尝试妄论之，詩与文，特言语之別称耳，有所记述之謂文，吟咏情性之謂詩，其为言語

16) 《蛟峰文集》補四，《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

17) 《鶴山集》卷五十二，《四庫全書》，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

18) 《絜齋集》卷八，《四庫全書》，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祐。

19) 《演山集》卷三十五，《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北宋建隆至靖康。

则一也。唐诗所以绝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²⁰⁾朱熹‘要在吟咏情性发於自然’，是要落实於‘本诚’。‘诚’正反映了从宋新儒学‘吟咏情性’诗本质论角度来判断诗歌价值标准，即是‘真诚’与‘虚伪’。“感物吟志”，“摇荡情性，形诸舞咏”作为创作特徵的‘吟咏情性’是人个体‘情性’的自然呈现。这可以从宋代理学家的诗作中，窥豹一斑。

“子寿言<论语>所谓‘兴於诗’，又云‘诗可以兴’。盖诗者，古人所以咏歌情性，当时人一歌咏其言便了其义，故善心可以兴起，今人须加训诂，方理会得，又失其歌咏之律，如何一去看着便能兴起善意。以今观之不，若熟理会论语，方能兴起善意也。”²¹⁾朱熹点出的‘善意’，自然是指古代儒家圣人之道德规范。“诗本触物寓兴，吟咏情性，但能输写胸所欲言，无有不佳。世多役於组织雕镂，故语言虽工，而淡然无味，与人意了不相关。尝观陶渊明<告俨>等疏，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忻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懽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至，自谓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真意。及读其诗，所谓‘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又‘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直是倾倒所有。备书於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谁无三间屋，夏月饱睡读书，藉木荫听鸟声，而惟渊明独知为乐，则知世间好事，人所均有，而不能受用者，何可胜数。”²²⁾从这段描述，叶梦得在强调吟咏情性的重要性的同时，指出‘语言虽工，而淡然无味，与人意了不相关’，说明诗的语言与创作主体的人意的辩证关系，他以陶渊明为例要写出平生真意，必须以意为主，也就是按照诗人的意图去创作。

严羽《沧浪诗话》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诗本质论的见解。“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

20) 《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四十二，《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

21) 《朱子语类》卷三十五，《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22) 叶梦得，《石林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726页。

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於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²³⁾ 他明确地指出‘诗者，吟咏情性也’的诗本质特徵，为了实现这个终旨，诗歌创作上要求‘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对宋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创作倾向，表示不满。并对宋朝诗人做了评价，认为‘唐人之风变矣’。

宋代诗话中，‘吟咏情性’所负载的诗学本质论观点，逐渐由继续反映儒家诗学功用主义扩充为深入表现个性气质，情绪情感等，包括在内的大量无意识心理内容，用‘吟咏情性’来表示诗学本质论观点，主要目的在於强调诗歌内容的纯真无邪，自然而然的创作手法，进而突出诗人高尚的情操，实现心灵的内在超越。这无疑是与宋朝当时的时代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联的。

III. 以意为主

语言作为人类进行思维与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理所当然地为抒情达意服务。作为语言艺术的精华诗歌来说，自然不能例外。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诗》以达意”之语，继承先秦儒家的‘诗言志’说，‘意有所郁结’，通过‘诗以达意’，既获得心理平衡，又引起社会共鸣。评说诗歌，首先探索诗人作品的志意，，同时也不能排斥说诗者本人的观点制约，因而应是这两者的结合。魏晋玄学关于‘言意之辨’，在当时虽然是哲学论题，但它却为

23) 严羽，《沧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九册，8719页。

後世的文论家理解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关系, 把握审美表现, 审美接受规律, 提供了哲学基础。其中,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文中, 论述了言, 象, 意三者的关系。‘以意为主’之说, 早在范晔的《後汉书·自序》中就有阐述, “文患其事尽於形, 情急於藻, 义牵其旨, 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 大较多不免此累, 政可类工巧图绘, 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 故当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以意为主, 则其旨必见; 以文传意, 则其词不流; 然後抽其芬芳, 振其金石耳。” ‘意’指的是‘意旨’, 文辞应服从於意旨。文辞只是为传达意旨而耳。宋代刘攽《中山诗话》中道: “诗以意为主, 文词次之, 或意深义高, 虽文词平易, 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 而不得其意义, 翻成鄙野可笑。卢仝‘不即溜钝汉’, 非其意义, 自可掩口, 宁可效之邪? 韩吏部古诗高卓, 至律诗虽称善, 要有不工者, 而好韩之人, 句句称述, 未可谓然也。” “先帝遗弓剑, 排云上紫清。同时受顾托, 今日见升平。” 虽不用事, 意思宏深, 足为警句。”²⁴⁾ 其中‘意’的含义是指诗人的见解, 好的诗作要求意深义高。在宋代诗学中, ‘意’的内涵更加复杂, ‘以意为主’逐渐发展成为宋代诗本质论的重要命题。

“<剑阁>云‘吾将罪真宰, 意欲铲叠嶂, 与太白‘搥碎黄鹤楼, 剡却君山好’语亦何异。然<剑阁>诗意在削平僭窃, 尊崇王室, 凛凛有忠义气, 搥碎, 剡却之语, 但觉一味粗豪耳。故昔人论文字, 以意为上。”²⁵⁾ 黄彻举例分析‘昔人论文字, 以意为上’, 进而说明以‘诗意’为主, 来作为评判诗歌的基准。欧阳修《六一诗话》中, “圣俞尝语余曰: ‘诗家虽率意, 而造语亦难, 若意新语工, 得前人所谓道者, 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境, 如在目前, 含不尽之意, 见於言外, 然後为至矣。’ … 圣俞曰: ‘作者得於心, 览者会以意, 殆难指陈以言也。’” 诗意主要指诗歌的思想内容, 而造语是指诗歌的语言形式。好的诗造语要工, 而且诗意要新颖。‘不尽之意’说明人类的思维想像是无限的, 梅尧臣要求诗家‘不尽之意, 在言外’, 就是把诗意与功用主义之类的观点, 理想, 道义简单表现要区分开来。强调了诗歌艺术思维和表达方面的特殊规律, 诗歌文学创作追求言外之意, 促进形象思维的命题。‘作者得於心, 览者

24) 刘攽, 《中山诗话》, 《宋诗话全编》第一册, 441页, 442页。

25) 黄彻, 《碧溪诗话》, 《宋诗话全编》第三册, 2368页。

会以意’而是从创作与欣赏的对立统一角度来阐明，新鲜的诗意由诗人传达到读者的完整过程。可见进入宋代‘诗意’说已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他进一步说明“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梅尧臣举例分析内外意，诗歌语言有两重含意，字面的意思应‘欲尽其象’，隐藏的含意应‘欲尽其理’，所谓‘象’是指可被认知的一切事物的具体形象，而意是指主体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宋代以後，对意，象概念，运用诗歌艺术思维规律，达到审美统一。‘理’为道理，儒家肯定的天理人性，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奉为最高的精神境界，视‘理’为诗歌创作的灵魂，核心，起着统率其他因素的主宰作用。宋代‘以理为主’反映了儒家诗论的正统性和保守性。“孔子以礼教人，犹必以古诗感动其善意，动盪其血脉，然後与体相入。未兴於诗而使立於礼，是真嚼木屑之类耳。况欲运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动，则天下固运不转也。”²⁶⁾ 传统儒家重视‘礼教’，提倡‘善意’，即道德修养，而宋代由於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影响，理学盛行，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谷黄鲁直诗话曰：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要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观杜子美到夔州後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後，文章不烦绳削而自合矣。”²⁷⁾ 宋代诗歌尚‘理’表现出士大夫阶层通过诗歌的创作，要求诗歌艺术符合道德伦理，体现人格意志的修养，从而表现崇高的精神世界。宋代诗学中，‘以意为主’与‘以理为主’的命题有相通之处，但‘以意为主’包含了‘以理为主’的内涵。‘意’的含义较之更广范，‘以意为主’说在宋代诗本质论中更有典型性。

關於诗之意与诗之语的关系，诗意由语言来表达，而语言是诗人去创作。语言是表达诗意的媒介，诗歌是文学的最高表现形式，诗歌对语言有着特殊的要求。杨万里论道：“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

26) 《龙川集》卷二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炎至德佑。

27) 《草堂诗话》卷上，《诗人玉屑》卷十四，《馀师录》卷二，《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

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茶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²⁸⁾他认为‘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去词’是不要过分强调诗语之工，‘去意’则不要有为诗。他又对诗意与感物进行了评述：“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於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或属意一花，或分题一草，指某物课一咏，立某题徵一篇，是己，非天也，然犹专乎我也，斯之谓赋。至於赓和，则孰触之，孰感之，孰题之哉？人而已矣。出乎天，犹惧戕乎天，专乎我，犹惧强乎我。今牵於人而已矣，尚冀其有一铢之天，一黍之我乎？盖我未尝觐是物而逆追彼之觐，我不欲用是韵而抑从彼之用，虽李杜能之乎？而李杜不为也。是故李杜之集无牵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韵之作。诗至和韵而诗始大坏矣。故韩子苍以和韵为诗之大戒也。”²⁹⁾ ‘无意’是指主体不能控制的冲动，激情的创作动因而言，‘初无意’，随着触物感事，就形成进入创作过程之後的主体自觉意识‘意’，自然诗出焉，特别指出‘过分强调和韵’，就不会作出好诗来。诗之本质不在言辞之上，也不在言辞所负载的意义上，而是在词与意之後，也就是言外之意。诗歌的本质属性不可能单纯从诗句和诗法中生得到，他是真实的情感与真实的景物相互作用而诞生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是诗歌艺术创作的特殊性。“《迂叟诗话》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罍，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恐，则时可知矣。…’”³⁰⁾ ‘古人为诗，贵於意在言外’，在此指明诗意含蓄的重要性，

28) 杨万里，《诚斋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六册，5983页。

29) 杨万里，《诚斋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六册，5964页。

30)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111页。

‘使人思而得之’，从欣赏诗作的角度，举例说明好的作品，需要意在言外。让读者去领悟，去感慨。“山谷云：‘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於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味，闲然入其门耶？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老，则子美之诗委地矣。’”³¹⁾ 黄庭坚赞美杜诗‘无意而意已至’，不刻意为文，不要刻意穿凿，无意於技巧辞藻，而意至的创作过程。“《绝句漫兴九首》 张文潜云：‘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自唐至今，诗人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有律吕外意。近来作诗者，颇有此体，然自吾鲁直始也。’”³²⁾ 张文潜肯定黄庭坚‘浑然有律吕外意’，不讲究诗法，句法的直抒胸臆的创作方法。《竹庄诗话》中：“东坡云：‘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於文字语句间求之。今皆作‘望南山’，觉一篇，神气索然。”³³⁾ 苏轼点明陶渊明之诗因寄其意，而‘悠然忘情’。“《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於子建，成於李，杜，而坏於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段师教康昆仑琵琶，且遣不近乐器十馀年，忘其故态，学诗亦然。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馀，汹涌而後发者也。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三人之论，其实一也。”³⁴⁾ 张戒诗论中，

31)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092页。

32)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114页。

33)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085页。

34) 张戒，《岁寒堂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3240页。

批评‘诗人之意扫地’，是因‘以议论作诗’，‘以补缀奇字’来创作诗歌的结果。他认为‘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馀’而其他诗人为文造情。最後又引用梅尧臣所说：‘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指明诗歌‘意在言外’的创作意境。

“《竹坡诗话》云：杜牧之《华清宫三十韵》，无一字不可人意，其敝开元一事，意直而词隐，有《骚》，《雅》之风，至‘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之语，置此诗中，如伶优与嵇，阮并席而谈，岂不败人意哉？”³⁵⁾周紫芝举例说明‘可人意’之诗有‘骚雅’之风，从而强调诗人之意的的重要性。“至於古人规箴训诲之意，伤今思古之作，与夫感创时物，记述节义，使後人歌咏其言，而有悲愁感慨之意，则为之扫地矣。然而歌词之丽，如梁简文，陈叔宝辈皆以风流婉媚之言，而文以闺房脂泽之气，婉而深，情而有味，亦大有可人意者。”³⁶⁾他又进一步指出‘歌词之丽’，‘风流婉媚之言’，‘闺房脂泽之气’亦大有人意。宋代士大夫大多出身於社会下层世俗地主家庭中，他们与商人和市民阶层本身有着天然的连系，因此伴随着城镇商业经济繁荣，反映社会世俗人情和审美趣味的思潮也同时跃跃欲上。古人‘规箴训诲之意’，使後人有‘悲愁感慨之意’，而具有‘婉而深，情而有味’的世俗人情才能‘大有可人意者’。此处‘意’的内涵既包含着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也有揭示人的情性论的部分。“《蔡宽夫诗话》云：‘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於诗者，诗为酸楚。闷以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乐天既遇闲，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屣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较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著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推渊明则不然，观其《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於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後可也。观三人之诗，以意逆志，人岂难见？以是论贤不肖之实，亦何可欺乎？”³⁷⁾‘闷以伤志’‘放浪物外’，‘随所遇而皆适’三种不同的‘以意逆志’。‘以意逆志’始见

35)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159页。

36) 周紫芝，《竹坡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844页。

37)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086页。

於《孟子·萬章上》中，“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這是孟子提出的閱讀和理解詩歌作品的方法。關於‘以意逆志’，宋代文人認為‘意’是指評詩人自己的‘意’，‘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也就是說評說詩歌，首先探索詩人詩品的志意，同時也不排斥評詩本人的觀點，因而要求兩者的結合，才能得出公允的評論。“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心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殞’，‘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以抒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為樂府，亦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诙谐，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勸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³⁸⁾ 宋人魏泰以‘皆得詩人之意’的詩句為例，闡明詩歌創作‘述事以寄情’時‘事貴詳，情貴隱’。若‘盛氣直述’則‘更無餘味’，會‘感人也淺’；但‘言盡意盡’，會‘更無餘味’。以‘言’‘意’與‘事’‘情’概念，對各朝代詩人和詩作進行分析，要求詩歌創作應‘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才能真正體現詩人之意。

何溪汶《竹莊詩話》中：“《漫齋語錄》又云：‘詩文皆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下語三分，可凡風雅；下語六分，可追李杜；下語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語要平易，此詩人之難。’又云‘有意中無斧鑿痕，有句中無斧鑿痕，有字中無斧鑿痕，須要體認得。’”³⁹⁾ 在詩作中，恰當地處理‘下語’和‘用意’正是詩人之難，指出‘詩文皆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凡裝點者好在外，初讀之似好，再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為主，輔之以華麗，則中邊皆甜也。裝點者外腴而中枯

38)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宋詩話全編》第二冊，1211頁。

39) 何溪汶，《竹莊詩話》，《宋詩話全編》第十冊，10047頁。

故也，或曰‘秀而不实’。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又子由<敍陶>诗‘外枯而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乃是敍意在内者也。”⁴⁰⁾ 吴可所谓‘敍意在内’，仍然强调诗意要‘含蓄不露’才好。“《珊瑚钩诗话》云：‘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以气韵清高深妙者绝，以格力雅健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⁴¹⁾ 则强调‘以意为主’的同时，要炼句炼字，但要求‘气韵清高深妙’。“山谷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於为诗也。至於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⁴²⁾ 黄庭坚进一步强调‘以意为主’之命题，但要求不能句弱，不能语俗，“《奉赠韦左丞丈》<诗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卖见後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赠韦见素诗>云：‘纨裤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自‘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皆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言误身如此也。则意举而文备，故已有是诗矣；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又云：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韦见素诗，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迟迟不忍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见素别，则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此句中命意也。盖如此然後顿挫高雅。”⁴³⁾ ‘命意’即立意，也就是确立诗歌的主旨，只有‘意举而文备’，再次强调‘以意为主’的本质论命题。《藏海诗话》：“凡看诗，须是一篇立意，乃有归宿处。”⁴⁴⁾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没’字若作‘波’字，则失一篇立意。如鸥之出没万里，浩荡而去，其气可知。又‘没’字当是一篇暗关锁也，盖此诗只论浮沈耳。今人诗不及古人处，惟是做不成。”⁴⁵⁾ 吴可批评‘今人诗不及古人处’，是因为‘失一篇立意’之缘故。“《石林诗话》云：‘王荆公晚年

40) 吴可，《藏海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六册，5539页。

41)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054页。

42)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084页。

43)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093，10094页。

44) 吴可，《藏海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六册，5537页。

45) 吴可，《藏海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六册，5541页。

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皆经纒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⁴⁶⁾ 诗歌创作，不仅要‘以意为主’，同时要‘字字细考之’，遵从‘意与言会，言随意遣’，做到‘浑然天成’，方能使诗歌高雅。宋代诗人关于‘意与言’关系作了不少深入探索。“《童蒙诗训》：诗皆思深远而有馀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⁴⁷⁾ “苏子由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後因见梦得《历阳诗》云：‘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皆历阳事，语意雄健，後殆难继也。”⁴⁸⁾ 宋代诗人以‘用意深远’，‘语意雄健’评价诗歌，反映了‘以意为主’的诗歌本质论，在宋代诗学理论中已成为重要的命题之一。“山谷云：‘诗文唯不造恐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山谷谓秦少章云：‘凡始学诗须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能成章。’…老杜诗云：‘诗清立意新。’最是作诗用力处，盖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摹旧作也。鲁直云‘随人作诗终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随人後’，此自鲁直见处也。近世人学老杜多矣，左规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终成屋下架屋，无所取长。独鲁直下语，未尝似前人而卒与之合，此为善学。”⁴⁹⁾ 黄庭坚屡次告诫後学，不但要‘先立大意’，而且应‘诗清立意新’。宋代诗人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诗歌创作历程，最终认定要超越唐代诗歌高峰，必须走出自己的创作道路，即‘自出己意以为诗’的正确之路。宋代诗话中‘新意’概念的提出，随处可见，如“语虽工而意浅陋。”⁵⁰⁾ “语意清新”⁵¹⁾ “又皆自出新意”⁵²⁾ “句意清高多类此”⁵³⁾ “则上下意相关，而语益奇矣。”⁵⁴⁾

46) 何溪汶，《竹庄诗话》，《宋诗话全编》第十册，10139页。

47) 吕本中，《紫微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893页。

48) 吕本中，《紫微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895页。

49) 吕本中，《紫微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899页。

50) 陈严肖，《庚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786页。

51) 陈严肖，《庚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797页。

52) 陈严肖，《庚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800页。

53) 陈严肖，《庚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801页。

54) 陈严肖，《庚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802页。

“然句意清快，亦自可喜也。”⁵⁵⁾ “寄意於古，而词语清新。”⁵⁶⁾ 可见，由於这种创新精神，宋代诗学理论必然自成系统，宋代诗歌发展变化，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格是与之分不开的。

IV. 诗言志，吟咏情性，以意为主的比较

宋代诗话中，除了不少寻章摘句，拾遗记趣之外，冷峻思考，关注现实，研讨创作批评理论的诗话为数众多。诗歌本质论也是宋代诗话所探讨和阐述的对象。宋代文人研讨诗本质论时，分别言及‘诗言志’，‘吟咏情性’，‘以意为主’等命题，这些重要理论在宋代再肯定，再发展，再融合的过程，反映了宋代诗学本质论的特徵。‘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人论述诗歌本质的最早命题。它包含着记事，言志，抒情等多方面的内涵，‘志’是其中主要部分。它关联着德行，政事，治身，治国等具有重大意义，关系着国家盛衰兴亡，社会风尚优劣等。所以，‘诗言志’说是在於强调诗的社会历史使命，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诗歌一直受到统治阶层及文人们的尊重，崇拜，是与‘诗言志’命题赋予诗歌重大社会历史功能分不开的。‘诗言志’的内涵包含着感情因素，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更强调思想志向方面。宋代是个平民化的社会，其统治体系以广范的庶族地主为基础的官僚政治机构。因此，伦理道德成了宋代维持社会最必要的精神力量。随着儒学复兴与理学的建立，宋诗创作正是诗歌文学艺术与新儒学之思潮相互融合的基础上，‘诗言志’命题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宋代‘诗言志’说中体现出时代的气息。

‘诗言志’和‘吟咏情性’都是表述诗歌本质的重要命题，但比较而言，‘吟咏情性’比‘诗言志’更接近诗歌的本质。情性是诗人对大自然以及人生的感慨，更具有审美的性质。诗歌美的根本，在於诗人感情的美。诗歌只讲究语言形式文字技巧，就不会有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自《毛诗序》明确提出了诗歌

55) 陈严肖，《庚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806页。

56) 陈严肖，《庚溪诗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2809页。

的抒情性质，推进了文人们对诗歌抒情性质的认识，是对古代诗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至宋代诗论家们肯定‘吟咏情性’更符合诗歌本质的同时，也承认‘诗言志’的合理性。因为‘诗言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诗歌的本质特徵。‘诗言志’和‘吟咏情性’的区别就在于‘志’与‘情’。‘情性’是心理学概念，一种主观体验，而‘志’是主体对外界目标的追求，具有功利性和目的性。二者有共同之处，都是指人的精神存在，属于观念意识范畴。宋代诗话诗论中，当感情与道德，理想相连系时，‘情’‘志’含意通常是一体不分的。但‘情’的范围较之‘志’更广阔，复杂，细腻，宋代诗论家们认识到‘吟咏情性’比‘诗言志’更深刻地揭示了诗歌的本质。但鉴于宋代性理学的发展，宋诗话诗论中，不少理学家强调‘吟咏情性’，旨在诗所表达的感情含有儒家的道德伦理，能感发人之善意。但不认为人格道德修养在于诗中宣讲仁义礼节，‘诗言志’诗歌本质论的核心即在于以情寓志，以志节情，要求诗歌创作中将情感体验与道德规范统一起来。反映在诗歌批评上，主张发扬儒家传统教化，就是要求诗人要吟咏情性之正。这正是反映了宋代诗学本质论的时代局限性。

‘以意为主’是宋代诗歌本质论中重要的命题之一，且颇能揭示宋代本质论的普遍性特色。由于宋代的政治文化领域是士人阶层一统天下，宋代历任帝王对文人极为重视并重用，因此宋文人们得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理想的生存环境。宋代士大夫不仅对社会政治以及人生价值加以关心，同时也不断追求诗文的审美价值，‘以意为主’顺应了宋代文学创作尚意的时代思潮，关于‘吟咏情性’与‘以意为主’，二者在宋代诗话诗论中是两大主要诗歌本质论观点。‘情性’与‘意’是创作主体不同层面的心理内涵，‘意’为诗歌主导的诗作，内容上讲道理，发议论，铺陈故实，讲究意新语工，言之有物，外枯中膏，重视诗法格调。‘情性’为诗歌主导的诗作，反映感慨幽情，闲愁思绪，自然呈现，反对刻意雕琢。但从宋诗话中，可以看到‘以意为主’说占有相当大的比率。宋人提倡‘以意为主’的诗学本质论观点，目的是在于突出认知性心理要素，强调社会价值观念在诗歌本质论中的重要性。宋代是一个重视传统，既成法度的时代，诗歌创作上已形成自《诗经》到唐诗的众多成熟规范。宋代诗人作诗，探讨诗学方向时，不得不重视古人的技法，同时‘自出新意’，最终

开拓宋诗发展之路。

‘诗言志’‘吟咏情性’‘以意为主’三者是对立统一的诗学本质论体系。宋诗话中三种命题的论述无疑是很丰富而深刻的，但也充满了矛盾。宋代诗学理论建立在传统儒家诗论基础之上，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政治关怀与忧患意识，必然反映在诗歌创作的本质理论上。儒家诗教传统与宋代社会现实都对诗歌本质论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因而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创作原则，使传统的诗歌本质论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充与深入。

<参考文献>

- 《宋诗话全编》，吴文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中国诗话史》，蔡镇楚，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
《中国诗学体系论》，陈良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宋代文学思想史》，张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中国古代诗学原理》，吴建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宋诗学导论》，程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
《岁寒堂诗话》，张戒，《宋诗话全编》第三册。
《朱熹诗话》，〈答杨宋卿〉，朱熹，《宋诗话全编》第六册。
《庚溪诗话》，陈严肖，《宋诗话全编》第三册。
《紫微诗话》，吕本中，《宋诗话全编》第三册。
《藏海诗话》，吴可，《宋诗话全编》第六册。
《竹庄诗话》，何溪汶，《宋诗话全编》第十册。
《临汉隐居诗话》，魏泰，《宋诗话全编》第二册。
《竹坡诗话》，周紫芝，《宋诗话全编》第三册。
《诚斋诗话》，杨万里，《宋诗话全编》第六册。
《碧溪诗话》，黄彻，《宋诗话全编》第三册。
《中山诗话》，刘放，《宋诗话全编》第一册。

- 《沧浪诗话》，严羽，《宋诗话全编》第九册。
 《石林诗话》，叶梦得，《宋诗话全编》第三册。
 《草堂诗话》卷上，《诗人玉屑》卷十四，《徐师录》卷二，《四库全书》
 集部。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五，《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游廌山集》卷一，《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论孟精义》卷四下，《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击壤集》自序，《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龙川集》卷二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炎至德佑。
 《朱子语类》卷三十五，《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
 《演山集》卷三十五，《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宋建隆至靖康。
 《絜斋集》卷八，《四库全书》，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鹤山集》卷五十二，《四库全书》，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蛟峰文集》补四，《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论孟精义》卷四下，《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
 《耻堂存稿》卷五，《四库全书》，别集类，南宋建炎至德佑。

<국문제요>

宋代詩話에는 문장을 찾아 글귀를 발췌한 것이 적지 않을 뿐만 아니라 현실에 관심을 가지고 냉정하게 사고하여 비평이론을 연구하고 창작한 시화도 적지 않다. 시가 본질론도 또한 송대 시화가 연구하고 논술하는 대상이다. 송대 문인들이 詩의 本質論을 연구, 토론할 때 각각 ‘詩言志’、‘吟詠情性’、‘以意爲主’ 등 명제들을 언급하고 있다. 이런 중요한 이론들은 송대에서 다시 긍정되고 발전되며 융합하는 과정을 거쳤는데 이것은 송대 詩學의 본질 이론의 특징을 반영하였다.

송대 시학에서 ‘시언지’와 ‘성정 읊기’는 모두 시가 본질을 나타내는 중

요한 명제이다. 송대 詩論家들은 ‘성정 읊기’는 시가의 본질에 더 부합되는 동시에 ‘시언지’와 ‘성정 읊기’의 구별은 ‘志’와 ‘情’에 있다고 주장하였다. ‘情性’은 심리학 개념이고 주관 체험이지만 ‘志’는 주체가 외계목표에 대한 추구로서 공리성과 목적성을 가지고 있다. 송대 시론가들은 ‘성정 읊기’는 ‘시언지’보다 더 깊게 시가의 본질을 드러낸다고 하였다. 그러나 송대 性理學의 발전을 감안할 때 송대 시화 시론에서 적지 않은 理學家들은 ‘성정 읊기’를 주장하였는데 이것은 시가 나타내려는 감정에 유가의 도덕윤리를 포함시켜 인간의 善意를 움직이려는데 있는데, 다시 말하면 시인들에게 본성의 바른 면을 읊도록 요구하였다. 이것은 바로 송대 시학 본질론의 시대적 한계를 나타낸다. ‘以意爲主’는 송대 시가 본질론의 중요한 명제 중의 하나로 송대 본질론의 보편적 특징을 잘 나타내고 있다. ‘以意爲主’는 송대 문학 창작의 의미를 숭상하는 시대적 사조에 순응한 것으로 ‘성정 읊기’와 ‘以意爲主’에 관하여서는 ‘情性’과 ‘意’는 창작 주체의 다른 측면의 심리적 내용이지만, 송대 시화에서 보면 ‘이의위주’설이 더 많은 비율을 차지한다. 송대 사람들이 ‘이의위주’를 제창하는 시학 본질론의 관점은 認知性 심리 요인을 두드러지게 하고 시가 본질 이론에서의 사회 가치 관념의 중요성을 강조하는데 있다.

‘시언지’、‘성정 읊기’、‘이의위주’라는 명제는 대립 통일의 시학 본질론 체계이다. 송대 시화에서 세 가지 명제의 논술은 아주 풍부하고 심각한 것은 두 말할 것도 없지만 또한 모순으로 가득 차 있다. 송대 시학 이론은 전통적인 유가 시론의 기초 위에 건립되었으며 송대 士人들이 천하를 자기의 직책으로 삼는 정치에 대한 관심과 우환의식이 필연적으로 시가 창작의 본질 이론에 반영되어 있다. 시에 대한 유가의 詩教 전통과 송대 사회의 현실은 모두 시가 본질 이론에 대하여 더 한층 요구하였기 때문에 점차 상대적으로 독립된 창작 원칙이 형성되었으며 아울러 전통적인 시가 본질 이론의 내용이 더욱 확대되고 심화되게 하였다.

주제어 : 宋代詩話、詩本質論、詩言志說、吟詠情性、以意爲主、繼承發展